

论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一直为人们关注着，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著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笔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国家中的理论家们也在这个问题上写了大量文章。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有些同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讲“物”不讲人，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不适用了，于是他们出来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本文想对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的一些论据作些回答，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一)

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总是喜欢用人道主义这根线索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成熟时期著作联结起来，回避和抹煞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 worldview、历史观上的根本对立，遗忘马克思从早期到成熟时期过渡过程中所实现的从唯心主义到一般唯物主义、从一般唯物主义到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飞跃和转变，从而论证他们所主张的在历史观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互相混合起来的观点。

实际的情况真是这样吗？难道果真是人道主义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联系起来吗？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了什么，继承了什么？难道马克思思想成熟的过程果真是人道主义思想加强的过程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常常被国外一些人错误地称作“比马克思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他的社会主义情绪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是“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是

“一本直言不讳的人道主义原文著作”。我们一些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同志也常常把这本著作做为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被人们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制订唯物史观的著作。因此只要考察从前一著作到后一著作所经历的实际过程就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费尔巴哈尖锐激烈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应有权威。他认为人不是象黑格尔哲学所说的那样是绝对观念的产物，黑格尔哲学本身倒是人本质的异化形式，因此应该批判和揭露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的实质，哲学应把人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思想受到了在实践中发现了黑格尔哲学存在问题的马克思的热烈欢迎，马克思曾经借助过费尔巴哈哲学来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就是在这种影响最大的时候写的。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对费尔巴哈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旧哲学的真正克服者。”1844年马克思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还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不能认为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就是一个地道的费尔巴哈主义者、人本主义者，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也是有区别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态度，马克思则不同，从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过程中看到了“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费尔巴哈虽然主张人本主义，却不重视劳动在人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堵塞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他虽然有着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却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则不同，一方面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基础，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同时又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人是自我创造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思想，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外化、表现、确证自己的思想。《手稿》虽然还不是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却显示了向唯物史观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手稿》把哲学考察和政治经济学考察结合起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资本、地租的关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就是一种明证。它表明马克思的方法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对人的直观的理解和考察。虽然马克思还没有从有关某种人的类本质、关于不变的“人的本质力量”的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还明显地具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透过那些人本主义的哲学术语看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

然而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过程究竟是进一步扩大和发展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呢？还是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克服其思想影响呢？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直接批判费尔巴哈的，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因而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批判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性。马克思在这个提纲中把他要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因而这个提纲被恩格斯誉为表达了新世界天才萌芽的文件。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这本书

的目的，马克思后来明确指出是为了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阐述他和恩格斯的见解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对立。在这本书中，他们指出离开现实的尘世关系去谈论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无异于科学消遣。他们对于把历史看作“人”的发展过程、看作“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种历史观持清楚明确的否定态度，认为这种历史观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他们还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在探讨历史的时候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由此可见，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不是《手稿》中存在着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进一步扩大的过程，而是《手稿》中所存在的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冲破并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束缚而滋长的过程，是唯物史观从思想到术语的全面制订的过程。

上面的叙述表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也是他本人世界观、历史观的转变过程，他曾经经历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又从费尔巴哈到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两个彼此区别又彼此衔接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完成的时候，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明显地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第二个阶

段，马克思实现了一般唯物主义向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通过克服费尔巴哈的哲学影响的形式实现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过：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有的同志据此推论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的直接来源，因此马克思主

义继承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和人道主义吻合的。马克思的话是十分深刻的，我们这位同志的推论却是不正确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脱离了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来考察人的问题，把人只是看作一种生

物学上的物质存在，这在自然观领域是唯物主义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这种对人的了解是直观的，当把这种了解推广于社会历史领域，解释社会历史问题的时候，就成了人道主义历史观。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同他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是相吻合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直观的唯物主义必然得出人道主义历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必须以直观的唯物主义作为其一般世界观的理论根据。因此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上克服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历史观同在一一般世界观上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是同时进行的，两者是互为前提、互相推进的。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异化劳动之后，紧接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面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及对于人的直观理解，提出了自己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提纲。这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正是在这个提纲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全面制订了唯物史观。这几年人们常常强调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决定意义，但是我们想指出，没有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全面突破，马克思也不可能完成全面制订唯物史观的工作。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同实践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一般世界观相吻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互为前提、互相渗透、互相为用的。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向直观的唯物主义倒退必然在社会历史观上从唯物史观向人道主义历史观倒退。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事实推导出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结论，这只能表明，作出这种推论的同志是在历史观上谈论着人道主义，也在实际上把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混同于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

总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地继承的时候，所继承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础，即自然领域中的唯物主义，但是对这种唯物主义也批判了它的直观性，更批判了由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所得出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又把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和入道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的同志说：“对入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摈弃的只是它的称号，不是它的实质。”不对。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扬弃，不仅表现在人本主义的术语上，更主要的表现在思想实质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不是绝无联系的两个马克思，但是把两个时期的马克思联系起来的思想线索却不是入道主义，而是唯物史观的萌芽、滋长和形成。我们在否定把两个时期的马克思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的时候，还必须如实地承认从青年马克思到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过程是世界观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的存在正是表明了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同包括入道主义历史观在内的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也同旧唯物主义有原则区别。人为地用人道主义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联系起来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否认和抹煞了唯物史观和入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二)

宣传入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总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等同起来，把两者都归结为人的哲学，并且想方设法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混合起来，甚至要用人道主义历史观来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只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在理论内容上作一比较，就可以进一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包括某些同志把入道主义作为历史观宣传时的某些观点)的根本对立表现于下列问题。

1. 考察和说明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入道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则是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关于前者，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论述。他们指出，他们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而是现实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认为这些前提是可以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关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也有明确的论述。他们指出，费尔巴哈是从人出发的，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根本没有讲到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他们指出，施蒂纳把抽象的人作为单纯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并认为“人”创造了历史。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者司徒卢威时，也指出他的出发点是脱离了生活条件、生产关系体系的“木偶”。

有些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谈到自己出发点时说过“现实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就作出推论说：“费尔巴哈是从人出发，马克思也是从人出发，区别就在于费尔巴哈是从生物学的孤立的、抽象的人出发，而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实践的、社会的人出发。”这个推论表面上承认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出发点上的区别，但却实际上通过抽象把两者的出发点都归结为人。在社会历史观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推论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推论中前二句话和后二句话之间只能二者择一，要承认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出发点的根本区别就必须否认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出发于人的结论，要得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出发点都是人的结论就势必否认两者在出发点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把自己的出发点和费尔巴哈的出发点相区别相对立在哪里呢?只要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他们出发点的论述，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观点正是表现在“现实的”和“从事实际活动的”这几个字上面。因此从“现实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实际上在说从现实出发、从人们的实际活动及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只有从人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才能做到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反之，不管怎样声明从现实的人出发，也只能从抽象的人出发。费尔巴哈有时不也说要现实的人出发吗?但由于他不懂得从人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他所谓现实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因此要从“现实的个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中甩掉“现实的”和“从事实际活动的”而把“人”抽象出来，并且同费尔巴哈的出发点等同起来，就只能是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人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

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命题。出发点的问题是入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列宁在谈到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时，曾经把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概括为从物质出发，从物到思想、感觉的路线，把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概括为从感觉、思想出发，从感觉、思想到物的路线，在社会历史观中，出发点同样意味着认识路线的问题。从社会、从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就是主张从社会的实际出发。相反从抽象的人出发是什么意思呢?把人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剩下的是什么呢?或者是把某一社会关系下的人性夸大为绝对普遍的人性，或者只剩下人的生物学上的类的共同性。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这种脱离了具体社会关系而被夸大为绝对普遍的人性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因此把这样的人性作为出发点实际上就是把观念中的东西作为出发点，在后一种情况下，人的生物学共同性只是人们社会属性的生物学前提，它本身既不能说明人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别和对立，也不能脱离人的社会属性而单独存在。把人的生物学属性夸大为人的唯一的本质属性也是人们主观抽象的结果。从这种结果出发也只能意味着从想象出发。因此从抽象的人出发，实际上就是从理想的、想象的

人性出发，就是从意识、观念出发。这样，出发点的不同，意味着对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根本不同的解决。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就是用人们的社会存在说明人们的社会意识；从抽象的人出发，就是用人们的社会意识说明人们的社会存在。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在出发点上的根本对立就是否认两者对于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不同解决，就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2. 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规律、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也存在根本对立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们的活动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揭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了在这种矛盾运动推动下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和更替，从而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如实地描述为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基于物质生产活动而不断发展的历史，虽然中间充满着曲折和反复，但总的趋势是前进和上升。在这里衡量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在评价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时候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是阻碍、破坏还是促进、保护、解放。

历史唯物主义在揭示社会发展过程客观性质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作用。历史是由人们的活动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人们的活动以及人们在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发展规律是在人们活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指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要受现实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形成的客观规律的制约。人们在从事活动的时候可以抱有这样那样的目的，但这种目的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它对客观规律的符合程度。人们在评价历史的时候，也总是从某种利益出发，但这种价值评价的正确程度却取决于它是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人们只有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在活动中获得自由。那种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只讲物不讲人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入道主义历史观则不同，它从抽象的人出发，把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的发展，用“人——非人——人”的历史公式把人类历史发展概括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又把人的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对于人的价值、尊严、幸福、生存的追求，归结为人对于自己的意识。有的同志说：“历史的发展不过是人的准备和形成的过程而已，人类

对自己所持有的这种强烈的人的意识，完全是人所独有的，是人的全部价值和尊严的基础，是推动人的发展和完善的强大力量。正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幸福，人才孜孜不倦地实践和探索，正是为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才永无休止地创新和追求。”对于这里说的观点，我们只要引一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就完全可以把它说清楚了。马克思、恩格斯说：“哲学家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

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个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

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

入道主义历史观由于抹煞了社会基本矛盾，抹煞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动力，也就只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描述理想社会，而理想社会的实现不是诉诸对人们的道德说教就是寄托于个别天才人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所以是空想，就是因它在理论上建基于入道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入道主义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直接对立的。

3. 由于出发点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和入道主义历史观在考察人、人性、人的本质时有着根本对立的方法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有着根本对立的观点。

入道主义历史观撇开了人们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撇开了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把人的本性、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归结为把人们纯粹生物学地联系起来共同性。有的同志说：“不论怎样，人终究是要把人当做人，当做与自己同一类中的一员的。即便是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对敌对阶级也需从确认对方是人为前提的。在猎场上，不可能设想去感化一只狼，但在阶级斗

争战场上却可能实际地感召一个比狼凶残十倍的敌人。所以，人类的类概念，是对人的性质一个最为基元的规定。所以人对人总应按历史规定的限度来满足其对自然和社会的要求的，这已构成为人间的一条准则，这个准则也就是入道主义、广义的入道主义。”对人作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考察，用人的生物学共同性否定、代替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社会本质，或者把人的生物学共同性看成高于

人的社会本质，并以此出发谈论人的各种问题，这就是入道主义历史观在考察人、人性、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方法论特点。入道主义历史观谈论的人是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个人，谈论的人性和人的本质是超历史、超现实的，是抽象的、不变的。这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入道主义历史观根据这种抽象的人性来回答和解释诸如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目的、自由、幸福等等问题。在入道主义历史观看来，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目的、自由、幸福就是这种抽象人性的实现。在历史观上谈论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自身、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等就是从抽象人性出发谈论这些问题的命题。从抽象人性出发，入道主义历史观把人與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同于生物学上的关系，宣扬个人主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任何人又都不能离开社会，在社会之外的人只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初生的婴儿如果不进入社会而离群索居就不可能具有人的社会本质，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生活的实践性决定着人的社会性，决定着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就不是脱离了现实社会关系的个人，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的利益、要求、心理、感情、思想，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本质。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由于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地位形成着人们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本质。社会关系又决定、制约着人的本质的历史变化和发展。有人觉得，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又怎么成了社会关系的总和呢？产生这种看法就在于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人们的活动必须依赖于客观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们在活动中形成着不以人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因而这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反过来决定着、制约着、形成着人的社会本质。在阶级社会中，就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居于不同的地位才形成着不同的社会集团，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人们最主要、最本质的属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现实的、具体的，这并不意味着一谈人的问题必须谈具体的张三李四，为了讨论人的种种问题，进行科学的抽象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必须区分人的科学抽象和抽象地谈人。历史唯物主义否认在社会历史观领域抽象地谈人，但不否认对人的科学抽象，也决不允许用抽象地谈人来混同、佯称为对人的科学抽象。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一般地提出人的价值、地位、尊严、目的、自由、幸福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承认还是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在于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在于对这些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否认的只是从抽象的不变的人性出发来回答这些问题，认为这样的回答是一种对人的非科学意义上的抽象考察，从而作出的回答也不可能是科学的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从人们的社会关系出发，从个人和社会的辩证关系出发，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人们同社会的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地位、尊严、目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社会，既不存在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地位观、尊严观、目的观、自由观、幸福观，但是这些观念本身是由人们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它们的实现程度归根到底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程度。因此在社会历史观这个领域中，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抽象的极限，超出这个极限，把社会关系也抽象掉，就不是科学的抽象。当然在社会历史观之外，在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学考察时，可以把人仅仅理解为生物学上的一个类，仅仅考察这个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但这种考察也不应该完全脱离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

(三)

宣传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同志总是喜欢把我们过去实行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在今天条件下实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磨灭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的论据。我们说，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也不意味着否认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必要性，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人道主义历史观，可以保证健康地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甚至从人道主义历史观那里寻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都是错误的。

首先，我们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是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

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原则、道德规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世界观是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关于世界的总观点，历史观是围绕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则是在由社会舆论和人们觉悟来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起作用的原则和规范。一定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都联系着、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都以一

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作为其理论根据。但是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又不等同于世界观、历史观，犹如各门社会科学都依据着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但不能把各门社会科学同世界观、历史观等同起来一样。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

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就是从人性、人道出发讨论和回答社会发展诸如动力、规律、社会进步尺度、人的本性本质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不从世界观、历史观上提出和回答问题，只是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角度来提出和回答问题。如在伦理道德领域中要不要把人作为人来看待，怎样叫做把人作为人来看待，要不要讲人性、人道、怎样才算讲人性、人道等等。

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是可以作这种区分的。在夺取政权的革命年代，指导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同时提出和实行了革命的人道主义，效果是很好的，有利于当时革命事业的发展。今天提出和实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过去战争年

代革命人道主义的发展，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了范围和丰富了内容。既然我们只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那末利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来抹煞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就是毫无根据的，担心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会模糊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对立也是不必要的。

其次，就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来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存在着一系列的根本对立。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价值出发来提出它的伦理道德原则、提出它的人道标准的，并且往往把这种人道标准同反抗反动势力所不得不采取的革命暴力对立起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出发提出人道标准和道德要求的。这种人道标准和道德要求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的地位和利益，表现为国家和社会对人民群众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表现为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关心。这种尊重和关心的实际内容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断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把自己的人道原则同打击和反对各种反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阶级斗争对立起来，相反把它看作在人民群众中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完全排斥要把人作为人来看待这一口号，但是把这一口号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基础之上。有的同志说，我们在医务工作中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时候“‘救’‘扶’的对象是人的整个的类。”这只能说是一种善良的主观愿望。无数的事实表明，过去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战场上面对那些顽抗到底的反动派，仅有这种善良的主观愿望是十分危险的，今天面对那些不肯认罪伏法而又有顽抗行凶能力的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情况也仍然如此。这些敌人只有当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和认罪伏法才能成为对其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对象，才谈得上给他们以“人道”待遇的问题。

在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个领域中，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所以有一系列的根本对立，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历史观。因此这种对立在实际上反映和表现着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实行和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仅没有为磨灭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提供论据，反而表明着这种对立的深刻程度。

再次，我们在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并不是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唯一的或最高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而是如实地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总体中的较低层次、较低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生活在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不同层次上发生相互关系，如存在着社会普通成员相互之

间的关系、普通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某种社会职业、社会团体、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内部之间及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层次性决定着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层次性。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总体中就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求在一定现实条件下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社会主义劳动者则还必须实行劳动者所应有的道德要求(包括应当遵守各种职业道德)，至于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还必须实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道德要求对于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来说，是应该实行的较低层次的道德要求。对于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来说，仅仅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共产主义的道德要求。

我们在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时具体地阐明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表明我们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对待伦理道德问题的，这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往往把自己的伦理道德要求当作唯一的最高要求，把人道标准当作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根本区别也深刻地反映着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抹煞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把它们“混合”起来或互相归结，不管主观动机如何抱着“完善”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善良愿望，其结果不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今天和将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当然，我们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应该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丰富和发展的道路决不是用人道主义历史观来补充或代替历史唯物主义。

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是理论联系实际，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通过这种研究，发掘一些没有被研究和宣传过的思想、范畴，对那些已经得到研究和宣传的原理、范畴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些研究工作应该同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地发生着科学技术革命。人们预计，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纤通信、激光、海洋开发和新材料等新兴技术将迅速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革命改变着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改变着人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联系交往方式。生产中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迅速增加，传统意义上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在减少，脑力劳动和轻微的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职员在增加，从事创造性脑力劳动的科学家、技术家、教育家、医生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的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也发生着深刻影响。这种形势给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提出了许多重大而迫切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怎样估计它的影响，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基本矛盾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比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将会具有什么新的形式和特点，对于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观点应该怎样评价。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里也有一系列问题，如何在世界上发生科学技术革命的形势下加快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多层次的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使这种结构对于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形势具有更强的适应和灵活变动的能力；如何进一步调正和完善我国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生产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实现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如何完善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经济管理责任制，如何调正和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改革领导体制，使其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如何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加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在内的思想道德教育，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等等。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点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是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科学回答的两大现实课题，其中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迫切需要研究和回答的课题。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等方面进一步显示出优越性和生命力，只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深刻的理论分析，更有说服力地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才能进一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才能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原刊载于《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6辑，1984年12月版)